红河学院人文精神学术文丛

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





张勇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现代化视野下的中国教育（1862-1922）》
《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
《中国古算家的成就与治学思想》
《中西文化精神》
《红河流域社会发展国际论坛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ISBN 7-81112-079-8

9 787811 120790 >

ISBN 7-81112-079-8/I · 104
定价：30.00 元

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



张勇 著

云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张勇著.
—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6
（红河学院人字桥学术文丛；1）
ISBN 7-81112-079-8

Ⅰ.中… Ⅱ.张… Ⅲ.①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宋代②古典小说-文学研究-中国-元代
Ⅳ.I207.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0816 号

红河学院人字桥学术文丛

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

张 勇 著

责任编辑：龙宝珍
责任校对：何传玉
出版发行：云南大学出版社
印　　装：昆明银河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5.25
字　　数：235 千
版　　次：2006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7-81112-079-8/I·104
定　　价：30.00 元

社　　址：云南省昆明市翠湖北路 2 号云南大学英华园内
（邮编：650091）
发行电话：0871-5033244 5031071
网　　址：http://www.ynup.com
E-mail：market@ynup.com



张勇，1969年2月出生，云南建水人，副教授，现任红河学院红河流域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1992年毕业于云南师范大学中文系，获文学学士学位；1999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获文学硕士学位，导师巩本栋教授；200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古籍所，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章培恒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学习和研究，出版过专著《元明小说发展研究：以人物描写为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博士文库第五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发表十余篇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论文。近十年来以中国古代小说为研究重点，努力追求独树一帜的研究方法以推进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型，同时也开始关注以越南为中心的东南亚汉学研究，尝试拓展中国文学的研究空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红河学院人字桥学术文从”（第一辑）编委会

编委会主任　于志伟
编委会副主任　宋焕斌
编委会成员（按姓氏笔画排列）
田志勇　龙　瑶　白　云　刘　卫
朱　明　李俊生　郑伟林　张　勇
张平海　郭亚力　黄兆龙　彭　强

总　序

2003 年秋，红河学院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正式成立，成为一所地方性综合高校。为了把这所年轻的高校办好，办出自己的特色，在上级主管部门和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学校从基础设施建设、教师队伍建设、课程建设到机构调整、二级院系的重组等等工作，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但是，最重要的工作还是学校的教学和科研。作为一所大学，如果不能把握教学这个中心，提高教学质量，就没有生存的可能。同时，没有与之相辅相成的科研和学术活动也不是一所真正的大学。因此，从红河学院组建之日起，科研和学术活动就成为学校最重要的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高度重视。学校先后组建了学术委员会，重新改版了学报，搭建了学术交流平台“红河论坛”，先后邀请了一批国内外知名学者到学校举办讲座，与国内外有关单位一起举办了“‘红河流域社会发展国际论坛’首届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构建和谐社会专题研讨会”等重要的学术交流活动，组建了“红河流域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增拨了科研经费，制定了鼓励教师出科研学术成果的奖励方法，在校内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氛围。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一些教师在做好自己教学工作的同时，努力著书立说，已经撰写了一批有一定学术价值的著作，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还将有更多的学术著作问世。为了鼓励学术活动，创造学术氛围，提升学校的办学水平，学校决定以“人字桥学术文丛”命名，出版红河学

院学术著作系列丛书。

“人字桥”的物质原形是由中国昆明至越南河内的滇越铁路上的一座巨形钢架桥，位于红河州境内的崇山峻岭之中，始建于1907年，1908年12月竣工，由法国女工程师鲍尔·波丁设计。该桥以“人”字形支撑，横跨67米的两山峭壁之间而得名。以20世纪初的交通、技术和设备条件，修建这样的大桥是十分困难的。据史料记载，在一年多的施工过程中，死亡中国工人800多人，可见工程之艰巨。该建筑1998年被列为云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红河学院学术著作系列以“人字桥”命名，是学院的一批学人反复揣摩而确定的。我想它之所以以“人字桥”来命名原因有三：

其一，“人字桥”是红河地区境内的标志性工程，以“人字桥”来命名红河学院学术著作系列，意味着红河学院的学术研究将主要立足红河地区，立足红河的历史、现状和未来。红河地区是祖国南部边陲一块神奇美丽的土地。她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有420多万人口，包括汉族在内的10个民族共同繁衍生息在这里。她有文字可查的历史两千多年，除了以建水县文庙为代表的大批文物古迹和以熊庆来、袁嘉谷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和科学名人以外，还有著称世界的“万亩梯田入云端”的哈尼族梯田文化，占世界锡总产量三分之一的发达的采矿冶炼业，全国最大的烤烟和卷烟生产业，著名的葡萄酒“云南干红”的生产基地等等，这一切都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广阔自由的天地。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活动虽然各有特点，但是在源于生活、来自实践这一点上是相同的。所以把“人字桥”作为红河学院学术著作系列的名称，就是说红河学院的学术研究不仅要立足红河、扎根红河，而且要为红河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尽可能地提供理论的依据、历史的借鉴和发展的可能，使红河学院的学术研究最终服务社会、贡献社会。

其二，滇越铁路是20世纪中国大西南连接国外最便捷的通道，而“人字桥”又是这条通道的咽喉隘口。从文化意义上来讲，“人字桥”也是连接和融合中外文化的桥梁。以“人字桥”命名红河学院的学术

著作，就是说它首先应该弘扬和光大中华文化，因为它博大精深，有五千年的渊源厚重的底蕴，但是我们绝不应因此而成为狭隘的民粹主义者，中外文化各有所长，也各有所短。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它所展示的人文精神成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推动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动力，而这恰恰是我们所缺乏的，也是我国近代经济社会发展落后于世界列强的最根本的原因。改革开放近三十年来，我们在指导思想上一个巨大的成就就是改变了对西方意识形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的武断的态度，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优秀文明成果是全人类共有的文明成果，我们同样要借鉴和利用。同样，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把博大精深和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传播到全世界去。“人字桥”学术著作系列就是要对中外文化进行比较，在比较中获得启迪，在比较中获得发展，最终获得融贯中外东西的世界眼光和国际性的研究成果。

其三，学术研究是人类独具的思想性活动，是非常艰苦的社会活动。它需要传承，需要积累，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历史和学术活动的实践证明，任何一项不朽的学术成就，都是社会性成果，都不可能是单个人的纯粹创造，都只能是站在千百个巨人和无数的普通人的思维成果上的耀眼的闪光。“人字桥”学术著作系列就寓含这种以“人”架桥的精神。就是说每一项学术成果绝不仅仅是展示个人的聪明才智，只认识到这一点是比较渺小的。它的根本意义在于为人类一步步认识自然、认识社会、认识自我的普遍规律砌好铺路石，搭好阶梯。至于谁能达到当时认识的最高峰，其实并不重要。一个真正有良心的学者都应该懂得这一点，因而自觉地为高尚的、人类独有的学术活动竭尽全力，作出最大的奉献．这就是“人字桥”学术著作系列的最高和最根本的精神。

如前所述，红河学院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年轻的大学，它目前的学术活动的规模和学术研究的成果还不是很大，与国内、省内的许多大学相比还自觉惭愧，但是它所推崇和实践的“人字桥”学术精神，将随着红河学院的成长而成长，随着红河学院的壮大而壮大，其每一

部学术著作的出版都是红河学院成长壮大的一个坚实的脚步。

以“人字桥”命名红河学院学术著作系列提出者的睿智让我钦佩，应该感谢他们！

红河学院党委书记



2006 年 5 月 22 日

序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学术界方法论的热潮中先后译介到国内来的西方美学、文艺学理论和学说，大概只有叙事学和接受美学等少数的几种理论，现在还不断地为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者们所运用，并取得了许多令世人瞩目的成绩①。接受美学这里不必说，运用叙事学理论来研究中国古典小说，张勇博士的《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叙事发展研究》，无疑是一部在观点和方法等方面均具特色、创获颇多的著作。

方法是不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的，只要这种方法有助于解决我们所要解决的问题，就可以拿来为我们所用。困难是如何从文学史发展的实际出发，从问题出发，将理论方法的运用与作家作品的研究与具体的文学现象的分析和文学发展过程的探讨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而不是从概念出发，生搬硬套，穿凿比附。

张勇曾对中国古代白话短篇小说发展的外部原因和内在进程都做过全面细致的研究，这是他从叙事学的角度来描述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前提条件。比如他对宋代说话繁荣的社会原因

① 运用接受美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史，邬国平先生的新著《中国古代的接受文学与理论》（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5），是近年来这方面的代表作，而运用叙事学研究中国古典小说，杨义先生的《中国叙事学》（人民出版社，1997）、王平先生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王昕先生的《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中华书局，2002）等，力作颇多。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就做过探讨。宋代说话繁荣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然而他透过许多纷繁的社会现象，指出说话的商业化才是宋代说话繁兴的最主要的原因。因为市镇和城市的大量涌现与扩大，给说话人提供了潜在的表演市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和集中，给说话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听众；伴随着这种流动和集中而产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现象，则又给说话人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创作题材；至于国家商业政策的调整、社会价值观念的变化、坊市制的打破、营业时间的不受限制等，又为说话赢得了宝贵的自由发展的空间；而行会的大量出现，能够保证说话的商业化有条不紊地发展，并有利于其表演技艺的提高；商业活动和节日的表演不断，带给说话发展以很多机遇和活力；教育的进步和落榜人员的增加，使说话的人才资源比任何时候都丰富，而且也提高了说话人的整体智力水平和文化素质。

总之，说话的中心任务是娱乐服务，为人类的游戏和娱乐天性服务，瓦子勾栏让这种服务得以日常化和制度化。当说话人在那些勾栏之中开始谈天说地时，说话的商业化就正式开始了，因为此时它才在业已沸沸扬扬的城市商业经济中找到了一个根本的立足点，技艺在市场中变为商品。商品经济的发展为说话提供了立足点，也为其提供了商业化所需要的市场。

作为娱乐业和服务业的说话及其他“百戏伎艺”，在城市商业经济各种物质条件准备齐全、发展充分以后，顺理成章地登上了历史舞台。与前代相比，在这一过程中说话发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变化：一是艺术庇护人由上层贵族变为市民大众，二是表演场地由宫廷宅第转到商业市场。正是这两个根本性变化使说话赢得了自由和自主，这是发展所需要的重要条件。于是，以市场为中心，说话人、听众、市场三者之间开始在城市商业经济中联结成为一个整体。说话人在一个固定的舞台上面对一群听众讲说种种故事的商业行为、艺术行为和市场体系就这样形成了。有了固定的市场，有规律的活动才成为可能，而只有成规律的活动才能形成发展规模，有规模才谈得上繁荣。说话人靠卖艺

为生，只有讲出的东西有人听他才能生存，听众的反应就是市场的反应，他们捧场与否对一个说话人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此他必然要考虑到听众的审美需要和审美水平。反过来说，听众既然需要这种形式的娱乐，他就会受到这种形式的影响。说话人的历史道德观念，他们对于一个事件的叙述方式及其艺术效果，都会对听众产生重要影响。市场、说话人、听众在相互依存中互为因果地推动着说话的发展。当然，连结它们关系的纽带是金钱，他们的活动是一种艺术活动，但首先是一种商业活动，然而正是这种赤裸裸的受市场经济支配的经济行为，提供了说话繁荣的内在动力，也正是这个动力，才根本性地推进了说话的繁荣。《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梦粱录》、《醉翁谈录》对说话家数、说话人的文化修养、说话的艺术要求与艺术魅力、说话或话本名目的记载和论述，正好说明了说话在这个阶段之中所达到的历史高度。不走商业化的道路，要取得这样高度的繁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参见本书第一章）。在这样周密、深入讨论的基础上，他再进而论述在说话向白话短篇小说的转变过程中，前者给后者文体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讨论白话短篇小说在叙事模式上如何努力突破说话限制的趋势而形成其写作的特色等等，就不但符合白话短篇小说产生、发展并形成自身文体特征的实际，而且也是合乎理论逻辑的。

在此书之前，张勇撰有《元明小说发展研究：以人物描写为中心》一书[①]，虽然那主要是对元明以来的长篇通俗小说的人物描写进行的专题研究，但他所力图揭示的人物描写个性化的发展历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中国近世小说发展的历程。因为人物描写是手段也是内容，作为一个艺术整体，二者显然不可截然分开。当人物描写由类型化向个性化发展的时候，当人物描写由以情节为中心向以人物为中心转变的时候，则无论是演义历史、塑造神魔，还是描写爱情或表现世情，

① 张勇：《元明小说发展研究：以人物描写为中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年版。

中国近世小说在整体上向前发展并取得成就也是显而易见的。有了这种对中国近世小说发展的总体把握，再来从不同的角度（如从小说的叙事的角度）谈其中的某一部类小说（如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演进，其视野自然就较开阔，所论也就更切实了。

在中国古典小说的发展历史上，话本小说的出现是一个重大事件，然而从说话到话本、拟话本，从说到写和读，前者给后者带来了什么？其间的内在联系和区别又如何？便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在宋代以前，文言小说的发展已取得很高的成就，而在宋代话本小说兴起以后，文言小说仍有发展，那么近世话本小说与文言小说有何关系？也是难以回避的问题。至于白话短篇小说自身的创作技巧和手法在其发展过程中究竟有何进步，同样是值得深入探讨的。这一系列问题，前人未必完全没有做过关注和探讨，但一方面始终从对作品本身的细读和分析中提出问题，决不脱离具体的作品，另一方面又能将其统合在叙事学的视野之下，并把叙事的发展作为中国近世白话短篇小说发展历史的中心问题来进行研究，却不能不说是此书的特色之所在。

例如，作者通过有关说话的大量文献记载的考察和对作品的分析，认为说话艺术具有四个特征：游戏、寓教于乐、故事性和叙事性，而这四个特征——原则与技巧又被原则性地移植和继承到了白话短篇小说中，既促进也限制了白话短篇小说的发展。每种故事要怎么讲，要讲出什么效果，情节段落与节奏该如何把握，说书人都成竹在胸。这种说话的叙事原则和技巧又同时被移植到了白话短篇小说中。讲奸臣怎么讲，写奸臣就该怎么写，讲英雄要有什么效果，写英雄就该写出什么效果，冷淡处、热闹处说话如何收拾，白话短篇小说就怎样安排，说话中的诗、词也随之进入白话短篇小说。《京本通俗小说》中《碾玉观音》（《警世通言》卷八作《崔待诏生死冤家》）描绘了崔宁和璩秀秀的生死情缘，可真是做到了说话人说的“论闲怨遣佳人绿惨红愁”。《醒世恒言》卷十四《闹樊楼多情周胜仙》，写周胜仙与范二郎巧妙传情时真是“热闹处敷演得越久长”，整个故事的演进“敷演得有规模，

有收拾。”几乎每一部白话短篇小说都是在按照说话人讲故事的原则和技巧进行叙事。这是说话对白话短篇小说限制性的具体表现。但白话短篇小说自身在承袭了说话的优缺点的同时，也在努力冲破限制性而建立自己的模式，并进而在不同程度上促进或限制着后代小说样式的发展。一代又一代小说叙事模式的不断建立和不断被打破，贯穿了整个中国小说史的发展进程。

再如，作者又通过对十一篇有本事可考的白话短篇小说的叙事比较，指出这些白话短篇小说的创作虽多出其本事，但又进行了脱胎换骨的再创造，正是这种再创造使本事（文言小说）和白话短篇小说在文体叙事上有了质的区别。像承担重要叙事功能的人物的增加，合理情节的设置与铺叙，人物事件之间的密切联系，虚拟说话人作为叙事者对叙事的直接干预，人物形象塑造的改变或加强，本事所包含的意义内容的重新组织、改编和提升等等，都标志着后者对前者的超越。我们尤其不能不赞叹作者对作品叙事的细入毫芒的分析。罗烨编《新编醉翁谈录》丙集卷之一“宝窗妙语”收有《因兄姊得成夫妇》一篇，讲的是广州姚三郎家一对儿女与高客家一对儿女阴错阳差结成夫妇的故事，这个故事后来在《醒世恒言》卷八中被改编扩展而演变成《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两相比较，除了情节内核基本一致以外，《乔太守乱点鸳鸯谱》在艺术整体上已完全成为了一个独立的文本。即就其叙事来说，作者做了如下的具体分析：

> 《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一开始引用了一首《西江月》，说了姻缘是天注定的含义以后，接着说：“今日听在下说一桩意外姻缘的故事，唤做《乔太守乱点鸳鸯谱》。这故事出在哪个朝代？何处地方？那故事出在大宋景祐年间，杭州府有一人姓刘，名秉义，是个医家出身。妈妈谈氏，生得一对儿女。……”《因兄姊得成夫妇》则这样叙述：“广州姚三郎家，以机杼为业。其妻双生一男一女，女居长，状貌无别……”这

两种叙述法有什么不同吗？很不相同，前者说“今日听在下说一桩意外姻缘的故事”，显然，故事是由这个“在下”讲述的，后者就没有这个“在下”，而是直接由作者进行叙述，换句话说，有这个“在下”的文本是在作者之外又出现了一个讲故事的人，没有这个“在下”的文本则除了作者以外就没有另外一个讲故事的人了。作者作为记录者和“在下”作为故事讲述者的关系的重叠或分散，就构成了文本比较复杂的叙述结构。比起单一的作者叙述的作品来，作者和作者之上的讲述者两个层次的讲述，使故事产生一种双重架构，在作者、人物和事件之间起到了一种间离的作用，使作者、人物和事件在文言小说中那种紧密的关系出现裂痕，从而架空出了一个可以随时填塞叙事要素的虚拟通道，也就无形中增加了作品的意义空间，双重架构之间的挤压或碰撞随时会创造出文本的内部张力，故事就会从中产生双重的讲述效果。我们知道，这个“在下”就是作者之上的那个叙述者，这个叙述者是说话这种口头艺术的表现形式在文本内部遗留的一个部分，说话向白话短篇小说转变以后，说话人这个特定的讲述故事的角色把他的身份和讲故事的方式继续保存在白话短篇小说当中，使白话短篇小说的叙述结构形成了作者与说话人姿态的叙述者的二元存在和对立，这也是白话短篇小说与文言小说的一个显著的区别。“当时若是刘公允了，却不省好些事体，只因执意不从，到后生出一段新闻，传说至今。正是：只因一着错，满盘俱是空。”说话人姿态的叙述者在这里跳出故事之外对刘公的做法表示惋惜，超脱于故事之上对人物的行为和德性进行评论，是这种叙述者所具有的特权和法术 “自古道，若要不知，除非莫为。刘公便瞒着孙家，哪知他紧间壁的邻家姓李，名荣，曾在人家管过解库，人都叫做李都管。为人极是刁钻，专一打听人家的细事，喜谈乐道。

因他做主管时，得了些不义之财，手中有钱，所居与刘家基址相连，意欲强买刘公房子，刘公不肯，为此两下面和意不和，巴不能刘家有些事故，幸灾乐祸。晓得刘璞有病危急，满心欢喜，连忙去报知孙家。”在这里，这个叙述者一方面是无所不知的，李都管的情况他没有不知道的，包括他的隐秘的心机；另一方面，他在这里又行使了他控制叙事的法术，他在刘家和孙家之间插进一个人物，通过这个人物去干预了刘家的计划，使故事的讲述产生了变化，单线条的发展变成了多线条的发展，《因兄姊得成夫妇》中那种作者、人物、事件之间密不透风的关系被他撕开了一个裂缝，他塞进了一个人物，改变了故事的空间结构和意义含量，因此，这个说话人姿态的叙述者的出现，也同时改变了故事的叙述方式，在文言小说的叙述中，作者是控制一切的，但是在这里，作者似乎拿这个自大而又任性的叙述者也没有办法。

像这样精到的分析，在全书中还有很多，比如对白话短篇小说中“巧合”的叙事现象的分析、对错位和荒诞小说叙事的分析、对公案小说中制谜与揭谜的分析和对文学上的“蝴蝶效应”的分析，都是建立在对大量作品细读的基础之上的，其说服力显而易见。

至少在公元8世纪初，中国的叙事理论已经产生了，只不过这种叙事理论主要是由史学家从前代的史学著作中抽象出来的。如唐人刘知几在《史通》中专立《叙事》一篇，论之曰：“夫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至若书功过，记善恶，文而不丽，质而不野，使人味其滋旨，怀其德音，三复忘疲，百遍无斁，自非作者曰圣，其孰能与于此乎？”并谓“叙事之体，其别有四：有直纪其才行者，有唯书其事迹者，有因言语而可知者，有假赞论而自见者”。[①] 所标之格既高，分类亦堪称

① 《史通通释》，浦起龙通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